

《紅岩》

— 革命英雄的詩篇

共青团沈阳市委宣传部編

前　　言

《紅岩》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的热烈欢迎。书中英雄人物的光輝斗争事迹，气势磅礴，惊心动魄，悲壮感人，是一部向青年进行革命傳統和共产主义品德教育的生动教材。为了帮助讀者更好地学习这本书，我們編印了这本小冊子，以資参考。

——編者

目 录

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1
回忆挺进报及战友們	13
难忘的仇恨	22
做革命先烈的接班人	23
江竹筠烈士遺書	25
烈士們的豪言壯語	26
魔窟——“中美合作所”	28
《紅岩》評介及有关資料索引	30
“中美合作所”獄中歌曲兩首	32

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长篇小說《紅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

問 紅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讀完《紅岩》，作品里这两句詩在我腦中反复地回蕩不已……

感謝羅廣斌、楊益言同志，他們合寫的這部小說給了我深沉的教育與強烈的激動。作者以他們高亢的革命音調和現實主義真切動人的力量，謳歌馬克思主義者震驚古今的博大胸襟，伸張了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激發起人們向一切反動派作殊死鬥爭的意志，而使他們的這部作品成為1961年長篇小說中十分突出的一部佳作。

這是1948年—1949年解放戰爭臨近尾聲、蔣介石集團反動統治最黑暗日子里的山城重慶。黎明時刻，我黨的活動比任何時期都要活躍，敵人的鎮壓迫害也比任何時期殘酷，因而敵我雙方最後這場決戰，顯得異常劇烈。“沙坪書店”，這個黨的秘密聯絡站在局勢急劇進展之中應運而生；它的暴露、甫志高的叛變，又激起軒然大波，一下子把鬥爭推上更為曲折複雜、更為嚴酷激烈的尖端：一個個黨的幹部和領導人的被捕，一系列威逼利誘的審訊、縱橫捭闔[bǎi-hé]的迫害和滅絕人性的拷打……。但是，“臉不變色、心不跳”，四十八套美國刑法，折損不了共產黨員一根毫毛，“你們知道的，不能比叛徒講的更多！”无可奈何的敵人，只好把他們一一下獄。隨之，作者進入整部作品關於中美合作所“白公館”、“渣滓洞”兩個集中營里的鬥爭這個主要事

件的惊心动魄的描写，打开了一幅又一幅更为悲壮、更为慷慨、更为艰苦的斗争场景。

真正的共产党员，不畏艰险、不畏利诱、不畏威胁，更不畏牺牲。他们简直就是一块燧石，敌人越是敲打，就越能迸发出明亮的火花。什么美国人的杰作“披麻戴孝”的刑法，什么美国科学最新成就的“诚实注射剂”，都征服不了一个人的灵魂，那么一切“特效”也是无效。大不了拉出去枪毙，但是“死亡，对于一个革命者是多么无用的威胁！”

傲干奇枝斗霜雪。骨头硬、不怕死，就有胆量敢于和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哪怕是在敌人的刺刀尖上。不枪毙，就活下去；枪毙了，精神不死。连在监狱里诞生的婴儿，也活了过来，成为大家的“监狱之花”；无辜的“小萝卜头”，在狱中长大，连热闹的街市都梦想得和监狱一样冰冷；虽然骨瘦伶仃、发育不良，也活了过来，竟然成了一个聪明、机灵、替大人传递消息的惹人疼爱的红孩子！革命者并不是一吹即灭的纸火，他们斩不断、杀不绝，香烟万代，后继有人，战场上如此，监狱里亦复如此。革命者的生命力很强，尽管你百般折磨。

首先不怕死，然后争取晚死或不死；一天不死，一天和蒋家王朝势不两立。这是监狱斗争的特殊条件所决定的。重庆集中营是“魔鬼的宫殿”，是“活棺材”。我们带着镣铐，敌人提着大刀，任何时候、任何场所敌人可以把我们杀掉。只要不是胆小鬼，就得随时准备牺牲，保存高洁的气节；只要不是鲁莽家，就又得随时准备不牺牲，力避无谓的消耗。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在敌人最新式、最“科学”的集中营对政治囚犯生理上极端戕害、难友們痛不欲生的情况下，死对于革命者当然是个严正的考验，但是怎样才能够争取活着，怎样才能够面对屠刀打击屠刀，创造条件，为党继续工作，是又一个严正的考验。但我们的入关在牢里，没有走动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

甚至沒有喝水的自由。这样的特殊环境就决定了这場斗争，必須是意志的战争、智慧的战争和唇枪的战争相揉合的綜合战术，需要勇气，需要头脑，需要忍耐，許褚“赤膊上陣”的魯莽灭裂的斗法，并不是真正的勇敢。所以就必须善于觀察自己（对每个难友的熟悉，对每个新入獄同志的考察，对每个情况的調查，对每个反应的体察），也必须善于觀察敌人（了解敌人的情况，窺測敌人的动向，分析敌人的强弱，导致敌人錯誤的判断，利用敌人的疏忽）。因而就不能放过每一句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暗示和眼神，进行一种无形的战斗，以便團結自己，和敌人斗智斗法，等待时机，准备越獄。正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我們的同志运用了一系列巧妙、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既表现了共产党人誓死革命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表现了馬克思主义者敏銳的眼力和惊人的智慧。我們在作品里看到：有的同志（許云峰）进牢房时已經皮开肉綻、奄奄一息，竟然挺起身来，拖着滿身刑具从容不迫地散步，“他用硬朗的脚步声，铁镣碰响的当啷声，向每間牢房致意，慰籍着战友們的关切”。这是响亮的联络信号，是向組織忠誠的汇报，也是无声的答謝的语言——最动人最知心的语言。有的同志（江姐）受刑后滿身鮮血，昏迷地拖着无力的步子，但“战友的一瞥，胜过最热切的安慰……她搖晃了一下，終于站稳了”。此时无声胜有声，作者通过他状情傳神的毛笔，使我們想象到从“一瞥”的安慰和发問，到“站稳了”的致意和答复的一番“交談”，該是多么巧妙、多么会心的“交談”！有的同志（“瘋老头”）裝聾卖傻不是一年半載，而是十五个春夏秋冬，忍辱負重，臥薪尝胆，到最严重的关头才表明了身份，多大的毅力和胆識！更动人的莫过于《挺进报》事件的处理。齐曉軒預先就准备了獄中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他一直学着《挺进报》（紙条）上的字迹，所以敌人发现紙条之后，他不但挺身而出，营救了无辜群众免遭毒害，而且回答說消息来自看守特务們的報紙。

使敌人大失所望，为了不受“失职”处分，只好平息了这场风波：“以后，谁也不准再提这张纸条子的事情”。偷肉不成，反挨一砖，齐晓轩用对手射来的箭反射了对手，保护了自己，又打击了敌人。这是场相当威武机智的战斗。

敌人并不傻，经验也不少，狡猾阴险、手段毒辣。我们观察敌人，敌人也观察我们；我们制造敌人的错误，敌人也制造我们的误会。他们会看脸色、会设骗局、会耍手腕。不可否认，而且许多判断例如特务头子审讯许云峰和成岗时所作的一些判断，也确实是准确的。这就真实的表明了：和站在我们面前的提着刀的死对头——美蒋赏识的高级特务的斗争，是场极其严重、极其艰难的斗争！但是，敌人的本領强，我们的本領更强。自然，我们要走动每一步棋，都将付出相当大的心血！

解放军以泰山压顶之势渡江了，进军大西南了，山城上空炮声轰鸣，敌人准备逃跑了。愈是接近胜利，敌人愈是疯狂残酷，我们愈是需要把越狱时间提前，越狱就愈有可能，又愈有危险。

小说的情节愈是发展到最后，争夺愈是紧张激烈；作者就愈把一切斗争推向戏剧冲突的顶端，斗争就愈激越悲壮。

在解放山城的礼炮声中，在敌人炸毁山城的爆破声和机枪的扫射声中，越狱的同志们一个个倒下了、倒下了……。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血，把大西南的这块金刚石性格的“红岩”染得更有亮色，更有活力。面对如此坚不可摧的形象，作为读者，我们垂泪低下这颗对阶级敌人的高傲不屈的头颅。作品这种类似悲剧式的结尾，浓重地、又是真实地渲染了这场斗争的悲壮气势，也浓重地、又是真实地揭开了全国革命形势排山倒海般的、把牛鬼蛇神们荡涤以尽的喜剧式的序幕。从而强烈地、长久地激发起我们对烈士们铭志不忘的悼念和誓死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杨超烈士英勇就义时高声朗诵的这首

《就义詩》，借用来概括《紅岩》这首“正气歌”的主题思想，我觉得再恰当不过了。

二

和现实生活的真实情景一样，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不論它如何把生活加工、集中和典型化，它本身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总應該被承認是生活。确切地說，應該承認它是具体的、真实的、生动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使讀者，尤其是熟悉这部分生活的人在接触到它的时候，相信这是真的，然后走了进去，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艺术一切特点賴以存在的基础。《紅岩》首先給了人这种印象。可以設想，倘若《紅岩》的作者象有的作者那样，把穷凶极恶的高級特务，写得笨头笨脑，不堪一击，或者把我們獄中斗争的志士写得呼风喚雨、刀枪不入，将这場勇与智的决斗渲染得光怪陆离，将胜利的取得夸张得輕而易举，那么，人物的命运、归宿，故事的发展、結局，岂不变成作者手中的傀儡和积木，凭他随意摆布、任情差遣，落得个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寵之意？那就絕不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充其量“不过是体现得很坏的美好的企图而已”（別林斯基），实际上是一种浮夸、虚假的編造。但是《紅岩》并不走这条輕便的道路。它沒有把最容易追求离奇的情节惊险化，沒有把最特殊、最尖銳的斗争一般化，沒有把人物神化或丑化。它忠实于生活真实的描写，忠实于人物形象以及人物与环境关系的真实描写，把这作为自己作品的命意和艺术創造的基础和出发点。根基打稳了，借以抒发的革命感情、政治思想，才不致成为无源之水，而变为空洞抽象的叫喊。《紅岩》里描写的生活和人物，原来在作者的心里就是活生生的，因而才可能有作品里一系列的具体描写：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具体的关系与具体的矛盾。最后，用具体的斗争方式解决了集中营里具体的（一連串的、大大小小的、此时此刻的）冲突，既不同于战场、工厂、学校，又不同于其它时刻、其它地方的集

中营。这样，我們从《紅岩》里看到了一幅又一幅生动而可信的图景。正是有了这样真切生动的描写和獄中特殊环境下悲壯巧妙的斗争的描写，我們才如此信服地接受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才如此地确信后来在“魔鬼的宮殿”里真的会举行追悼会，真的会举行新年联欢。这不是一般的追悼和联欢，而是敌人刀丛中的示威、檢閱和演习。“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看这副对联写得多切題、多有余味！簡直是对景挂画，然而却不露痕迹。这不又是張《挺进报》嗎？

这一些描写，既真实，又动人。离开了現實主义具体反映的原则，那么，即使所写的是生活中实有的事件，也会出乎作者的所料，而不为讀者信服，更不为讀者激动。严肃的、具体真实的描写，显示出《紅岩》作者突出的艺术特色。

重庆集中营是座与世隔絕的冰冷的魔窟，政治犯們被剥夺一切的人身自由。因而关进这里的死囚們，很可能在牺牲的前一分鐘还得不到外部世界的任何消息。但由于革命者的足智多謀，善于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保持党組織强有力的經常性的領導，加强獄內战友們亲密无間的合作，銅牆鐵壁也竟然神奇地被打开一隙缺口，和重庆市委接通生命的臍帶。加之他們对事物敏銳准确的判断能力，就給了《紅岩》作者一种方便，使他們的目光四射，有条件把这座借地形和武力密封起来的人間地獄放置在整个大西南和全国革命形势广闊的时代背景上，不但不使作品前数章对当时斗争状况的描写陷于孤立，反使它成为整部作品賴以结构的有机肢体；而且水到渠成，讓獄中斗争、人物性格在与时代环境相互联繫之中，彼此作用、彼此烘托、彼此深化。工厂斗争、学校斗争、农村斗争这些即使十分側面的描写，也在这种复杂广闊的联接中显得波瀾壯闊——从而一个小小的、与世隔絕的集中营，居然向讀者打开了整个大时代的帷幕，概括了风云变幻、翻天复地的时代精神和特点。这是一部小說难得的成就。

《紅岩》所反映的斗争生活异常丰富。它的面广：从学校、工厂、农村、党的机关、特务机关到两所集中营；人多：从各种各样的学生、各种各样的特务、各种各样的革命者到各种各样的政治犯；事繁：从敌人内部倾轧和矛盾到敌我斗争。我們也可以更严格地要求作品写得再精炼一些，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作品的结构和角度是真正小說的结构和角度，不能不承認作者对如此浩繁的内容的安排經過了一番苦心的提炼和剪裁：书中绝大部分的篇章或者情节的存在，都有助于人物的描写。第三章里成瑤关心地把《挺进报》送给成崗看，不料遭到冷遇，引起她对哥哥的政治热情的怀疑。可是她作梦也沒有想到哥哥早就入了党，而且正是《挺进报》的印行者。成崗怎么好向妹妹暴露身份呢？这时作者写了成崗由此触发的一大段的回忆和心理活动，通过成崗的回忆和心理活动的描写，作者实际上在作品的序幕里向讀者介绍了作品的几个主要人物及其关系。手法简洁集中，可謂一以当十。小书店的开设，显示了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并为甫志高的叛变作了埋伏；甫志高的叛变，则又把斗争引向“渣滓洞”；为了展开作品另一个“更恼火的”据点“白公館”的描写，作者借助于蒋介石国共和談的骗局，讓特务假釋放刘思揚，而后把他轉送到“白公館”。作为长篇小說艺术形式上极为重要的人物的介紹，作者的安排則更为巧妙、更为简炼、更有濃度。那个常去书店讀进步书籍的青年，誰能知道他竟是个打进来特务？那个对扩大书店热情积极的地下党员，誰一眼能看透他就是叛徒？那个傻头傻脑、每天練长跑、对獄中斗争不关痛痒的人，誰能立刻識破他是最有耐心、最深謀远慮的鋼鐵战士而給予他政治上的信任？簡直是不露痕迹！看来似乎离奇，实則出于必然。倘若作者采用简单化的写法：特务眉毛顏色就表明是个坏蛋，叛徒一举一动都預示他将来的变节，地下党举凡出事都挺身而出暴露身份，那么敌我間复杂多变的斗争，岂不成为儿戏？但是作者也沒有走上另一个

极端：事事設套，人人猜疑，故作惊險，哗众取寵（《紅岩》題材很易墮入此类写法）。那是迎合庸俗趣味的低劣輕便的写法，不配表現我們的生活，更不配表現这个严肃的主题。

介紹人物，作者不采用自己出面直接叙述的刻板平直的办法，或者人物一出場就大段大段地抄录履历家譜那种吃力不討好的办法。怎样介紹人物效果好些，情况各有不同，需要作者根据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斟酌下笔。象許云峰这样重要的人物，到敌人审問拿出卷宗証实他的“罪狀”时，靠敌人的几个卷宗的原文，順水推舟地介紹了他的革命事迹；他被抬进监狱时，就象《三国演義》写諸葛亮一样，人物沒有出場，气氛已經烘托得够濃厚了。老許何人？难友們并不知道；他怎样受刑，作者沒有实写。但通过特务們押送来的一陣慌亂，通过遍身淋漓的血迹和难友們无声的关切，这許多不都清清楚楚了么？写江姐受刑后昏迷地回到獄中也是如此。这里主要是写眼睛：从同志們关注的眼神里，介紹了江姐坚毅的性格，“她搖晃了一下，終於站穩了”，推开搀扶她的特务，但走不几步便“扑倒”了。从昏迷——欲倒——清醒——站稳——扑倒，其中該有多少潛台詞！可是大家一句話也沒說。

从这里，同时也看出了作者在怎样写人，以及如何得力于精神面貌刻划、心理活动描写的艺术效果。作者刻划的几个革命者的形象，大都深沉感人。他总是在生死攸[yōu]关的严重时刻，讓人物表現出他們身上最宝贵的品質，并且着意加以烘托，无不激动人心。齐曉軒为《挺进报》事件挺身而出，最緊張的时刻“瘋老头”暴露身份，許云峰在地窖里暗暗为同志們越獄刨石洞，江姐牺牲前的神志和囑托等等一連串的描写，都是书中最精彩的篇章。写到斗争白热化、人物生死不保的关头，作者的语言变得短截跳蕩，甚至連呼吸也急促了，抑制不住心浪的倾溢，激动地彈撥出人物心弦的最强音。我們讀到这些地方，心情越来越

緊張，热血也沸騰得翻滾。在這裡，作者對人物精神面貌和心理活動的描寫，起到確切有力的配合作用。這也是從《紅岩》特有的題材本身——監獄鬥爭的具体環境需要出發的：監獄沒有一切自由，人們必須最大限度地發揮視覺的作用；以視覺代替聽覺，以無聲的眼神代替有聲的交談，以觀察代替調查。所以，他們就不得不盡量在極個別的材料里找到更多的聯繫，挖掘出更多的情報。這樣，他們的思維活動就比任何一般人來得更頻繁、更細致、更審慎、更周密。因而作者在人物精神面貌和心理描寫上下功夫的結果，就幫助他深化了人物的思想感情。

作品這一切深刻動人的描寫，是現實主義的勝利，也是浪漫主義的勝利。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同志，就是當時集中營里切身的受害者，他們實際的鬥爭，細致的觀察，真實豐富的生活素材，從長期艱苦鬥爭中磨練出來的對反動派刻骨的仇恨，對患難與共的烈士們深切的痛悼，以及作者向四川青年關於集中營烈士英勇鬥爭數百次的發言報告、革命回憶錄的寫作和創作小說時反復的構思修改，都早已為他們刻劃人物性格和選擇情节細節，提供了丰富大量的實生活的寶貴素材，為作者自己寫作時的思想和情緒，作了必要的準備，從而也為作品的旋律醞釀好激越慷慨、深沉悲壯的基調。正因為這一切都是從實際生活出發的，從作者的真情實感出發的，所以細節描寫、人物描寫不但真實，而且作者的風格和氣質能夠和人物的風格和氣質協調地揉合在一起。從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內心無法抑制的激動，或者說簡直看見了作者。思想上和藝術上的成就，將會使小說《紅岩》很快在讀者中流傳開來。這是部藝術品，更是部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有力工具。

三

《紅岩》中的幾個主要人物，都會散發過明亮的光彩。我真佩服作者的本領：人物寫得那麼多，具體到每個人物身上的筆墨又

那么少，却画誰象誰，抹一笔，是一笔，都用在点睛傳神之处，因而作品中一大批人物的名字，在我們脑海里变成活跳跳的真人。他們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感情上引起了我們的共鳴。这对长篇小說作者說来，是非常需要作到，又非常不容易作到的。但我曾琢磨过，是不是因为作者写的人物太多，精力分散，还没有从人物刻划上的“群星灿烂”进而达到“众星拱月”的高度，还缺少哪怕有一个象《王若飞在獄中》（姑且把它当作文艺作品来看）里的王若飞同志那样的典型性較高的、个性化較强的主要人物。当然，人物写得多并不是缺点，何况《紅岩》中的众多的人物也沒有因为作者把他們都推上舞台的前沿而显得拥挤不堪、面目模糊。那么，又是不是因为作者在艺术鍛炼上还不够成熟，沒有从其中挑选出一两个人物，然后濃墨重染，使他性格更为丰满、更为突出，充当一部艺术作品中人物布局上的群龙之首？我旋即又想，作品不但要写我們党的机关，还要写敌人的特务机关；不但写“渣滓洞”，还写“白公館”，它需要涉及的头緒很多。多一个机构，就多一批人物，人物未能写得集中也恐怕难免，何况作者又是初次运用长篇小說武器的新人。理由可能更多，但毕竟是个不足。

《紅岩》写成之前，作者曾經出版过一冊本子很薄但分量很重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紅岩》就是同一題材加工而成的长篇小說。小說写法和回忆录不同，需要作者作一些必要的充实和拆改，尤其是人物性格的描写和强化。这点作者作到了。和《在烈火中永生》相比，《紅岩》虽然保存了其中有历史价值的几个主要情节，但較之丰富得多了，諸如：①从人物性格出发，加强了人物刻划，并且把人物的活动在彼此联系中錯綜地交叉起来，給人物以自我表現的机会。在回忆录中，因为受真人真事的限制，只能作到零星地写人。②注意了故事情节的結構和发展。③注意写监狱与社会、与整个革命形势的联系，并且写了形形色色

的敌人，强调了时代特色。这两本书尽管形式不同，但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对照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红岩》的许多情节及其进程，来自真实事件。甚至有的人物（如江姐、老彭等）的姓名，也和真实姓名相同，而且绝大多数的人物，都有着明显、具体的人物原型。这样也许产生一个问题：《红岩》所以写得好，是因为真人真事本身动人，作者不过详细把它记录下来罢了。我们承认当年集中营的斗争本身是动人的，作者也确实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方面运用了原材料。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有些事件本身也很动人，而写成小说却不动人，甚至远不能算作艺术品呢？生活是作品的先决条件，然而不是一切条件，如果《红岩》只不过是记录，那么《红岩》中的细节描写、背景的点染、心理的刻画、气氛的烘托以及人物的出场与介绍的运用和方式、时机的选择，这一系列艺术形式上的努力和成效，将成为不可解释的了。当然，这里应该肯定，实生活的真人真事以及它的许多异常动人、很富于代表性的故事细节，都为《红岩》历史内容、主题思想的纵深方面和艺术表现方面，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由于作者对几个主要人物描写时，不愿（或不善于）离开实有的事迹，以免失真，尤其在江姐等用真实姓名的人物身上，更不愿集中概括更多人更为丰富的内容，作为小说创作，这就必然地造成一种束缚：束缚作者对人物典型化程度更高的追求，这也许就是造成上文提到的人物不够集中、缺乏主人公的不足的主要原因。这也就说明，《红岩》的成功虽然是很突出的，但在某些方面，还带着革命回忆录（这种与小说不同形式的方法）的痕迹。

我们一些文学创作者，还不能很好地从革命回忆录过渡到长篇小说的写作，《红岩》尽管还带着痕迹，但在这方面，终究提供了不少值得参考的经验。

我以十分激动和感慕的心情读了《红岩》。这是一部难得的作

品，革命情緒飽滿、感人力量強烈，足以激發人們的鬥爭意志。作者借他藝術的才能，向我們描述出一批革命者激烈悲壯的鬥爭歷史，譜成一首堪稱為共產黨人的“正氣歌”。作品中那些烈士們也和《在烈火中永生》中的烈士們一樣，生的偉大，死的光榮，永垂不朽，浩氣長存——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回忆挺进报及战友們

吳子見

小說《紅岩》出版了。这本书主要是通过“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監獄斗争，反映了1948年到1949年一年間，重庆的革命和反革命在最后决战时期的斗争事迹。它象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一书一样，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讀者。当我讀到书中成崗等同志办《挺进报》的那些章节，特别是讀到江姐和成崗等同志被捕后在獄中英勇斗争的事迹时，我不禁回忆起过去在重庆进行的地下革命斗争，也想起了《挺进报》，想起了共同办《挺进报》的那些亲密的战友江竹筠、陈然、刘国鋐等同志。和这些革命先烈在一起工作的一段經歷，是值得我永远紀念的；他們的崇高革命品質，也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解放前的重庆，是敌我斗争比較剧烈的一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蒋介石反动派严密控制的“陪都”，是反动統治的中心。自国民党政府从武汉撤退以后，坚决抗战与妥协投降，民主与独裁，革命和反革命，就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从抗战开始，我党就在蒋管区公开发行《新华日报》。这份報紙創刊于武汉，武汉撤退后迁到重庆繼續出版。八年抗战期間，它在蒋管区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引导千万讀者走上了抗日和革命的道路，一直是反动派的眼中釘。抗战結束后，它高举着反对內战、爭取和平、爭取民主的旗帜，当然更不見容于反动派了。

在全面內战打了九个月之后，于1947年2月28日，反动派封閉了我党在蒋管区的一切公开机关，包括重庆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被封闭之后，蒋管区的人民，听不到党的声音了，听不到我军进行自卫战争的消息了，大家感到十分苦闷和彷徨。

这时，我们原来在党的领导下办刊物的几个青年，便计划着编印一种地下报纸，来报道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让人们看到光明，受到鼓舞。特别在3月19日胡宗南匪军侵占延安之后，反动派大肆造谣叫嚣，更使我们感到有出版地下报纸的必要。

当时我们拥有编印地下报纸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搞到在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华商报》和其他进步刊物；同时，还找到了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的合适关系。我们之中的陈然同志，又是重庆南岸野猫溪镇上一个农具修配厂的厂长。这个厂依山建筑，陈然同志的家，就住在工厂高处的楼房里，环境比较僻静，便于印刷秘密报纸。加以这个工厂和当时其他许多工厂一样，没有、也不可能认真从事生产，所以工厂里冷冷清清，只有少数看守厂房的工人。这对于地下工作更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开始，地下报纸没有名字，编辑、印刷都比较粗糙。接着，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个报名比较好，便取名《黎明》。第一期《黎明》出版了，我们的心情是又紧张又兴奋。我们分头把报纸送给了自己最亲近的朋友。经过我的手送出去的，大部分是给了刘国鋐同志。他当时在民主人士、进步青年和学生中，进行着广泛的活动，需要大量的宣传品。

由于《黎明》刊头上有些问题处理不当，容易被敌人追踪破坏，刘国鋐同志建议另外改一个名字。我们根据他的建议，把《黎明》更名为《挺进报》，是用隶字写的刊头。

《挺进报》出了两期，有一天，刘国鋐同志告诉我：“地下党市委的彭咏梧同志要和你谈谈工作。”我十分高兴。五月的一天，老彭和我约会在白象街迁川大厦内刘国鋐的卧室里。一见面，他就象老朋友似地亲切对我说：“我们很了解你，现在党希